



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 张永康



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需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力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中，稳外贸、稳外资占据了“两稳”。科学评估、准确研判疫情对外贸外资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及早应对、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对于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外贸外资虽在短时间内会受到疫情影响，出现暂时性减速，但很快就会进入恢复性反弹增长阶段，基本不会影响全年大局

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当时对我国涉外经济曾造成一定冲击。剖析其对当年外贸外资所产生的影响，回顾总结当时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有助于我们及时评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外贸外资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前布局相关应对方案和举措。

非典疫情于当年4月暴发蔓延，对于经济的短期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4、5、6月份。当年7月之后，我国进入强劲的恢复性增长长期，进出口额双创历史新高，带动全年出口增长34.6%，进口增长39.9%。

当时受疫情影响，跨境人员交流受阻，大量经贸商洽活动停止、推迟，新订单开拓难度增大，由此造成第三季度出口增幅回落，同比增速降至30%。但在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就反弹至40%。当年我国出口额4384亿美元，增长34.6%；其中加工贸易同比增长34.4%，机电产品同比增长44.8%，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增长62.6%。可见，非典对我国出口虽然造成一定影响，但由于我国制定实施刺激出口得力措施，且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构成主力增长，使全年“保出口”得以顺利实现。

进口方面，医疗产品存在明显进口替代现象，“后疫情”阶段的投资热带动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当年全国进口增长高达39.9%。当年我国关税总水平进一步下调到11%，也刺激了进出口。

从山东外贸来看，2003年山东出口增长26%，超过2002年的17%增速；进口增长41%，超过2002年的18%增速。具体来看，上半年全省出口增幅超过20%，从7、8月份开始，我省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但是后四个半月我省出口进入恢复性反弹增长阶段，使得全年出口未受较大冲击。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仅为1.44%，大大低于2002年的12.51%；全年实际资金到位率为46%，低于2002年的64%到位率。

但当年山东实际利用外资(全口径)逆势达到112.6亿美元，增长73.2%，高于全国47.5个百分点。其中外商直接投资70.9亿美元，增长48.9%；实现逆势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当年韩国投资增势强劲，实际利用韩资28.4亿美元，增长93.1%，同时全年利用外资大项目增多、支撑力显

著，全年新批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650个，新批和增资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就有11个，其中一般机械制造业增幅最快，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总体来看，2003年非典疫情对我省外贸外资影响较弱。

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预计对我省外贸外资领域造成如下影响。

从外贸看，新签出口订单难度更大、出口供给短期紧张，中小型企业面临较大困难。服务贸易将受到明显冲击，旅游、运输、建筑、加工服务出口等会受到较大影响。

出口供给短期紧张，订单履约受影响，但不会产生严重的供给冲击效应。由于此次疫情发生于年初春节假期，正值企业和项目停工期间，随后全国进入联防联控状态，各行业贸易企业和制造企业受停工或复工延迟、资金链承压、投资延迟、出口报关、物流约束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导致短期供给不足而产生履约问题，尤其是部分外资大型项目在我省产业链供给受到一定影响，而且国外进口商可能会取消部分订单。因此我省当前亟须“保订单”。

进口方面，短期有进口需求受抑制和进口挤出效应，长期则会出现进口反弹。受疫情影响，第一季度全省总需求会受到明显抑制，导致进口需求降低，同时进口通关和物流运输等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占用部分进口资源产生结构性挤出效应；但是从长期看，为了应对“后疫情”阶段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强力反弹，我省进口必然出现迅猛增长，将对我省通关、港口、物流带来压力，同时，进口结构将会主要通过本年投资热的设备、原料和能源为主，服务贸易中的金融、保险服务进口也将明显增加。

利用外资方面。因外商推迟或取消来华商务活动，部分在谈项目或被搁浅，部分签约项目也将出现延迟开工、外资不到位等情况。但外商大规模投资转移的风险较小。虽然部分跨国公司可能会重构供应链，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完毕，只要我省总供给和总需求快速恢复反弹，产业政策适当倾斜外商投资信心不会受太大影响。

做好稳外贸工作，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出口退税力度，既发挥大型出口企业的骨干支撑作用，又全力帮助中小微外贸企业渡过“空转”难关，以抢抓恢复反弹期的重要时间窗口

疫情形势下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需要我们科学评估、准确研判疫情对外贸外资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及早增加政策工具篮子储备，在财政政策、外贸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加快制定实施一系列应对举措；完善外贸外贸工作在“应急”“后疫情”——两个阶段关键任务的推进策略。

在稳外贸尤其是稳出口方面，要做好以下措施。

“特事特办”，加码加量财政支持政策。除提前下拨外贸专项资金外，还建议：对出口总量增速突出的大企业给予补助；对企业开拓新兴市

场活动费用和出口保费加大补贴；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贴入选的保险机构范围，省市两级继续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强化贸易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对外贸融资项下的担保风险，提高省级贸易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承担比例。针对疫情影响严重的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和出口奖励。

进一步做好出口退税文章。从应对非典的经验 and 近年稳外贸实践来看，做好出口退税文章，将极大增强外贸企业活力。以2003年5月为例，当月出口退税额同比增长达4.6倍。今年要本着“特事特办”原则，进一步深化分类管理，使出口退税全面提速。根据出口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等情况，提高出口退税一类企业比例，对二类出口企业，压缩抽查比例；提高企业出口退税托管贷款利息贴息额度，探索出口退税信用贷模式，为出口企业降低财务费用。

利用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价格型数量型工具加码窗口，丰富外贸金融服务产品支持，既要帮助出口企业渡过疫情防控期间“空转”难关；又要帮助企业“输血”以迎接第一季度末可能出现的出口补偿性迅猛增长，快速恢复产能供给。

自贸试验区要大规模消化，优化202项可复制经验成果，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优势，大范围转化利用“一线放开”经验，发挥单一窗口效能，引进第三方检验检疫，“三合一”重“一”，分类监管等新举措，提升贸易便利化；大力开展国际转单业务，加快增加我省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的空港、海港国际物流线业务；尽快突破保税检测维修等新业态政策限制。

抓好骨干企业出口，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的支撑作用。对大型出口企业“一对一”联系，拿出促进出口方案，协助企业做好对接进口国商品标准工作，做好应对贸易救济调查准备工作。

抢抓“后疫情”阶段时间窗口，突击新订单，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从疫情结束到企业能够接订单，跨度最短一个月，长达一个季度左右。我省要做好抢订单准备，储备短期内恢复出口、开拓新市场的对策。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出口力度，发挥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齐鲁号”欧亚班列通道和载体效应。

稳外资方面，密切跟踪在谈和已签约外资项目，做到工作不停顿、联络不断线，大胆利用自贸区“一线放开”的先行先试优势，为外资进入创造更大便利，加大对优质领军型外资中小企业的精准引进力度

稳外资方面，可采取如下举措。

咬紧在谈和已签约项目，创造条件保证重点外资项目进度早到账、早开工、早投产。做好在谈外资大项目的跟踪工作，及时准确传递我省项目保障和疫情防控信息，做到联络不断线。

释放自贸区制度创新效能，大胆利用负面清单机遇“先行先试”，为外资进入创造更大便利。外商投资法实施后，自贸区监管体制和商事改革要围绕培育新领域新业态尤其是服务业开放的新动能而行，针对济南、青岛、烟台三个片区特

点，应着重在金融保险、融资租赁、境外旅游、非学历职业教育、生物医药保税研发等领域超常规地为外商资本进入创造便利。同时，尽快推进企业开展急需的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和跨境外汇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解放企业资本活力。

充分发挥各类招商平台、园区和载体效能。驻外招商平台应提前进入密集对接状态，打好客户对接和项目信息的“时间差”，储备一批项目信息；对各类招商平台的突出成果给予一定奖励激励；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媒介，开展网上招商。

对新兴产业投资的激励政策要有倾斜性。要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项目可给予适当优惠。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新批外资项目政策支持，包括新批和增资项目奖励。

利用好“后疫情”时期国家超常规投资机遇带来的外资热潮。可以预见，最迟第二季度起，我国将掀起新一轮基建热潮，要引导外商充分利用，利用我国接下来的反弹式增长和基建投资机遇；同时着重推介“后疫情”时代的5G通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保险等投资热点，务求山东新兴产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新突破。

瞄准基地型大项目，提升我省与日韩产业合作水平，压实外资基底。在山东与日韩深度合作上取得突破，是我省提升外资工作的关键。针对日韩大企业、大项目的招引，要以推进中日韩三方“产业链经济”合作，聚焦基地型产业园建设，推进大通道大通关建设为重点。目前急需打通三方电子口岸建设，由真正形成三方大通道大通关格局。高水平产业园作为新兴产业国际合作载体，已经成为先进省份争相竞争的重点。仅在2019年，就有成都中日产业园、广州中日生物医药产业园、武汉中日产业园、苏州中日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等竞相推进。目前，我省自贸区三大片区已陆续评定各自的中日、中韩产业园规划，需要尽快评估疫情影响，加快重大项目攻坚力度，优先创设三方产业基金，提升日韩产业人才在我省进出、执业便利。

围绕“市场获得型投资”，挖掘中小型外资项目，尤其是靠利基市场立足的优质领军企业。当前，外商对华投资驱动力已向以市场获得为目的的水平型投资转换，其核心诉求不再是政策优惠和要素成本，而是长期可预期的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根据2019年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期间部分企业反馈结果，大量中小型跨国公司期待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希望了解中国关于研发、营销服务等“微笑曲线”两端链条的配套基础。因此，新一轮引进外资务必要加大对诸如德国中小企业一干强、日本GNT企业等优质领军型中小企业的深挖力度。

稳定外资存量，加强与在鲁外企的信息沟通和服务体系建设。要想方设法安定在鲁外企的投资和经营信心，及时了解、帮助解决外企困难和需求，制订一对一服务方案。

总之，做好疫情形势下的外贸外资工作，除了短期超常规举措之外，还应深度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跟上当前外商对华投资战略变化，树立“市场逻辑”，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机遇，中日韩深化产业链合作机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机遇等，不断提升山东外贸外资工作水平，巩固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外贸外资整体态势。

(作者单位：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

“云问诊”破解分级诊疗困境

□ 周俊婷 李 勇

“互联网诊疗”可以放大延伸优质医疗资源，推动科学分诊，促进医疗信息互联互通，有效破解“放不下”“接不住”“流不出”“连不起”等分级诊疗现实困境，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优化配置。

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优势，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特别是对发热患者的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大医院之间、大医院与社区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在患者大量涌入甚至滞留在大医院的时候，缺乏合理的分流就医机制和路径，线下医疗资源在不均衡的压力冲击下，往往不堪重负。虽然分级诊疗推行已久，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堵点和难点。

“放不下”：大医院存在过度聚集效应。在我国，大医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床位数、卫生人员数增长率普遍较快。大医院的过度扩张，加剧了医疗资源的聚集，对周围的医疗市场形成了极强的“虹吸”效应，不但将周边低级别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吸引过来，也吸引了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其结果就是大医院每增加1张床位，背后可能吸引10名潜在患者，从而形成了“医院规模越大，患者看病越不方便”的现象。

“接不住”：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强。据统计，基层医疗机构与医疗卫生人员的学历、专业技术资格等差距较大，乡镇卫生院医生中专学历、中级以下职称占比较高。在保证基本收入的情况下，出于医疗安全、设备及药品短缺等原因，基层医疗机构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接诊病情较复杂或较重的患者。很多患者对基层医生也不信任，一般会跳过基层，直接进入大医院就医。家庭医生制度虽在不断推广，但签约率不高，全科医生数量也较少，普及仍有困难。

“流不出”：双向转诊通道不畅，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分工协作机制。由于疾病分级标准模糊，缺乏转诊标准与规范，加上医院的趋利效应，双向转诊实际趋于“单向”。同时，双向转诊在实施过程中仍不能解决专家对接及预约床位等问题。另外，现有的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虽然为分级诊疗提供了极好的方向，但实施效果甚微。各医疗机构目标不统一，存在多方管辖、组织涣散等问题，机构之间相互竞争，无法真正形成紧密的服务协作关系。

“连不起”：医疗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级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患者医疗健康信息无法得到有效共享，甚至医患之间的健康与疾病结果也不互认，导致患者重复检查等医疗资源浪费。特别是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化基础薄弱，转诊过程中信息不能有效对接，可能延误诊疗与治疗。在医院内部，医患之间因信息不对称，产生一系列矛盾与纠纷；医患之间也缺乏及时、有效、连续的沟通交流，不利于资源互补与优化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互联网医疗充分发挥了远程、便捷、专业的特性，为抗击疫情开辟了“第二战场”。“云问诊”在放大延伸优质医疗资源，推动科学分诊、促进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破除当前分级诊疗推行瓶颈，推动我国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还应在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

构建转诊信息系统，释放大医院诊疗压力。基层首诊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与基础。患者在基层就诊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可通过转诊渠道上转医院，利用互联网分诊医疗系统大数据，精准分诊到合适的医院。如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以根据诊疗案例历史数据库及临床知识查询库等，对比分析，判断患者疾病的轻重缓急，结合线上分诊专家的咨询与解读，实现科学转诊，真正把守“守门关”。同时，上级医院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健康医疗服务数据进行疾病诊疗，其治疗信息也会同步转回基层，患者可再通过转诊系统回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构建远程医疗系统，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在分诊或会诊的过程中，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可以在上级医院的临床指导与教学中，提升自身医疗水平与技能；同时，通过上级医院优质医生的现场指导与技术下沉，提升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赖度。除此之外，医生可以在线上为患者提供远程诊疗与指导，特别是对偏远地区患者，使患者就医更高效、优质、便捷、可及。

构建数据中心，使各医区主体互联互通。数据中心是贯通线上与线下数据的中心池，包括个人信息、注册信息、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诊疗信息、医学影像检查、患者主索引等，可以通过收集、存储、运算、分析等功能，实现各医区主体信息之间的互通共享，精准对接与传递，构建大数据分析模式库和疾病诊疗、药物循证、就医行为、慢性病管理、健康预测与评估等知识库，以“云形式”为各医疗服务主体提供分诊与健康服务系统运行所需的医疗资源与数据应用服务。

构建健康服务体系，使用医疗服务便捷、有序。健康服务体系可以为用户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科学分诊、预约挂号、获取信息、医疗支付、健康教育、健康监控等服务，主动关注患者健康，提高患者就医的及时性、可及性与体验感。比如，居民可利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信息传输，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可通过在线问诊服务，进行健康咨询，如有需要，可以线上预约挂号，系统可将患者科学、精准分诊，推荐到合适的医疗机构就诊，简化就诊程序，节省就诊时间。同时，就诊过程中产生的检查单、处方等，可通过网络直接发送到患者的移动设备上。需要缴费时，患者可直接通过移动支付方式付费。就诊后，患者会定期收到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复查随访等信息；对需要长期监测心率、血压、血糖等的患者，会即时上传，方便医务人员监测；数据如有异常，会即刻通知患者。健康服务体系会随时跟踪并记录患者的健康服务或就诊环节，使健康医疗数据可追溯、监管与互通，为患者健康服务提供证据与指导。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以更大金融支持，防范中小微企业“断链”

□ 张志元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主力军”，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但其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疫情影响下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困难，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亟须加大金融供给支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

中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与活力来源。疫情冲击下，加大金融供给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疫情对于中小微企业，有形影响和无形影响兼而有之。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同时，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也会产生冲击，对产业链的上下游也会造成影响，这意味着员工和客户流失将成为影响中小微企业生存和恢复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物流等外部因素，也会影响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

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告急，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其“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内源融资。疫情影响下，自有资金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企业陷入生存发展困境，迫切需要政府给予金融供给支持。

目前，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金融供给困境，主要体现在金融供给“慢”、金融供给“难”、金融供给“贵”三个方面。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还会遭受流动性、贷款期限及贷款成本等多重考验和压力，使其自身经营状况、复工复产等进一步恶化，获得金融供给“更慢”；疫情冲击下供应链的稳定性、员工和客户的流失等，使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产品压力、销售压力和回款压力都会增加，获得金融供给“更难”；疫情冲击使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难以在短期内对所有服务对象的复工情形和今后发展作出客观评估，全链条的冲击使其“自顾不暇”，部分金融机构可能还会出于多种原因承担部分服务对象由于疫情冲击所造成的损失，那么未来就需要其服务对象来弥补，致使部分中小微企业在中长期恢复中获得金融供给“更贵”。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主力军”，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由于自身特征和宏观环境

变动，其金融供给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加之本次疫情冲击，对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短期内，我们必须全面加大支持力度，以及及时有效的对策举措，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生存、复工问题。

扩大财政补贴范围，增强财政补贴强度。疫情影响下，员工的流失、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员工的薪酬等，是中小微企业亟须破解的主要矛盾。因此，政府在此阶段应更注重“撒钱”。一是扩大财政补贴范围，将之前不符合财政补贴要求的中小微企业也部分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确保财政资金最大化帮助企业“渡难关”，保证供应链完整，解决生存问题。二是增强财政补贴强度，现阶段能够复工复产的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较高的资金支出问题，流动性是当下企业生存的根本。政府应增强补贴强度，最大程度地覆盖企业的职工薪酬、新员工培训等费用。三是完善财政补贴监督和惩罚机制，建立突发事件下的内外监督和多重审计制度，保证财政补贴资金的效益水平。

合理降低税费负担，提升财政资源配置灵活性。疫情冲击会造成中小微企业运营成本和部分隐性成本抬升，对此要进一步加强减税降费力度。对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短期内建议全额减免其应承担税费，或者通过延长税费期限及创新金融工具等方法，解决其“后顾之忧”，以形成完整的复工复产链条。对于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弱而主要受供应链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可适当降低其本财年的税率和费率。同时要利用好财政贴息杠杆，引导金融机构对中小

微企业进行自发性“输血”行为，一方面降低中小微企业金融供给成本，另一方面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使金融机构获得持续性金融供给的信心。此外要落实财政政策的差异化激励，提升灵活性。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中小微企业，要明确财税政策激励目标，如扩大投资、产品研发等，相机抉择以确保财政资源配置的灵活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金融支持。疫情冲击下，考虑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货币政策短期内更适宜下调MLF利率从而引导LPR下行或者采用定向降准刺激经济。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中小微企业原本就存在着金融供给“贵”的问题，疫情背景下其融资成本势必进一步提升；二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及复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因而帮助中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也是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应注重银行等金融部门金融供给渠道的通畅性，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序合理。政府可考虑发行专项国债，适当提高债券的利率和久期。

适当免除部分企业金融供给成本，延长金融供给期限。疫情冲击下，金融部门自身也经受了考验，但相对来说中小微企业的形势更为严峻。对此，金融部门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对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企业暂时免除金融供给成本或适当延迟其到期期限；依靠前期的金融供给关系，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关系识别，强化疫情期间关系纽带在金融供给中的作用，包括关系型融资等；“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主动识别中小微企业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对于其中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企业主动与之对接，辅导其通过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通过这种方式盘活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以点带面。同时，金融部门要主动拥抱现代科技，依托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完成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与自身合规性的监测。

中长期阶段，政府支持应更多转向政策引导，注重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消解疫情冲击，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变迁，提升治理水平。

